

論魯西畫像三石——朱鮪石室，

孝堂山，武氏祠

勞 幹

一 石刻畫像與繪畫

在某一種藝術特別發達之時期，往往影響其他藝術。中國當商時大抵爲銅器上之裝飾最盛之時代，故安陽發現者，從衣服之圖案（從此可推出布帛之紡織），以及齒牙骨石器之雕刻，以及壁飾儀仗，皆與銅器取同一之圖案（據梁思永先生所論定）。西周銅器之文飾則不過殷商之餘波支裔，雖稍變化，然不離其宗，此後即一步一步衰落。至戰國晚年即有全無文飾之銅器，再至漢代所有銅器除鏡鑑一小部分外，皆爲樸質無華，以銅器之裝飾爲中心之時代，從此過去。然戰國銅器之中，尙有新奇現象，即鑄出較生動之人物，而非如商代全以幾何圖案爲主體，甚至鳥獸形體亦成單純之圖案化。其中狩獵圖象頗多，詳見徐中舒先生古代狩獵圖象考（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此種風氣之來原，現在尙不能完全明瞭，然春秋戰國以來，繪畫藝術之發展，實爲深可注意之事。如此，自然可將以幾何圖案等簡單裝飾爲中心之時代變成以繪畫爲中心之時代。壁上文飾商代雖有，然不過鑲嵌工藝之一種，仍不能謂爲即係後世之壁畫，左宣二年稱『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亦與壁畫未必盡同（史前時代已有壁畫，然中國較進步之壁畫當在春秋戰國以後）。楚詞天問王逸追序當時之事，曰：

屈原放逐，……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儵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

則明指壁畫，此雖漢人追述，然非如此不足以解天問也。又山海經所言異物，大抵

亦由記述壁畫而然。至關於器物之圖畫，如考工記云：

畫績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圓，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績之事，後素功。

又韓非子外儲說：

客有爲周君畫筴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筴者同狀。周君大怒。畫筴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周君大悅。此當然爲寓言，但當時如繪畫之藝術不發達，亦決想不到此事。又外儲說：

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曰『鬼魅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亦是戰國以後關於繪畫之紀載，其敘述較早之事如說命上：

『夢帝賁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於傅巖之野，惟肖。』

實本於史記商本紀。而史記商本紀如下所言，實非畫象：

『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
故武丁得傅說最先尙是以名字徵求，此事與王莽指名求王興王盛之方式如出一轍（見漢書王莽傳）。惟王莽先不知王興王盛是否可用，僅根據讖緯；武丁或由『舊爲小人』，早知傅說可用，藉夢的啓示，以應於父兄百官，動機雖異，方式仍同。
說命所言根據畫象特其衍義而已。

至於漢代，言繪畫之事愈多，其見於兩漢諸書者如：

漢書成帝紀，告甲觀畫堂。

劉澤傳，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畫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

廣川王越傳，去即繆王齊太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

又，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祖楊傳粉其旁。

又，廣川王海陽，畫屋爲男女羸。

蘇武傳，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注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

霍光傳，上止畫室不入。

又，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迺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

楊惲傳，惲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過此問其過可以師矣。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

金日磾傳，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向之涕泣，然後迺去。

趙充國傳，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迺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王莽傳，莽乃博徵天下工匠，諸圖畫，以望法，度算，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作者絡繹道路。

叙傳，上以伯新起，數目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爲無道，一至此乎？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也。

後漢書朱祐傳論，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

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凡三十二人。

後漢書宋弘傳，弘當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爲徹之。

後漢書姜肱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言感肱疾……工竟不得見之。

後漢書陳紀傳，豫州刺史嘉其行，表上尙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

後漢書延篤傳，永康元年卒於家。鄉里圖其形於屈原之廟。

後漢高彪傳，詔東觀畫彪象以勸學者。
後漢李業傳，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其形象。
後漢陽球傳，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勅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松覽皆出於微蔑斗室小人，依憑世戚……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
後漢紀王莽使長安中諸宮署及天下鄉亭皆置伯升象，旦起射之。
意林引新論，前世俊士立功垂名，圖畫於殿閣宮省，此乃國之大寶，亦無價矣。
東觀記，高彪除郎中，校書東觀，後遷外黃令，畫彪形像，以勸學者。
後漢西南夷傳，又是時郡尉府舍皆有雕飾，畫山神海靈，奇禽異獸，以眩耀之。
蔡邕傳兗州陳留聞皆畫像而頌焉。
淮南子主術訓：文王周觀得失，偏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皆著於明堂（高注著猶圖也）。
後漢書朱穆傳注引謝承書：……宦者趙忠喪父，僭爲瑤璵玉匣，穆下郡案驗。……帝聞大怒，徵詣廷尉。……冀州從事，欲爲畫像置廳事，穆留板書曰，勿畫吾形以爲重負忠義之未顯，何形像之足紀也。
孔子家語觀周篇：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
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扆，南面而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
御覽七百五十孫暢之述畫，漢靈帝詔蔡邕圖赤泉侯楊喜五世將相形象於省中，詔邕爲讚仍令自書之。
蔡質漢儀（初學記十一引），尚書奏事於明光殿中畫古烈士重行書讚。
又（初學記二十四引），省中皆以胡粉塗壁，此小素界之畫古烈士。
從以上紀載，繪畫從春秋戰國到漢代，日漸發展，而銅器則日漸衰落。可證明繪畫之地位代替以前冶鑄之地位。固然在商代自有繪畫，如最近在安陽發現的殘鼓；漢代亦有精巧之冶鑄，如鏡鑑之屬。惟殘鼓花紋變化較少，而鏡鑑的花紋則

變化較多。(註一)殘鼓的花紋與銅器屬於同一系統，鏡鑑的花紋則大多與漆器屬於同一的系統，漆器花紋並不由銅器演出，而與繪畫有密切的關係。則謂繪畫代替以前冶鑄之地位，自不能謂為無理由。

中國最早的人物繪畫在洛陽韓君墓發現，而最早之漆器則為壽縣楚王墓的朱畫棺蓋。韓君墓之彩畫，發現後即歸毀滅，無從窺其究竟。壽縣漆棺現藏歷史語言研究所，雖圖案仍為戰國式，而其用筆設色頗與漢代彩繪多有類似之處。晚至最近和縣發現之晉墓，其漆棺的斷片雖小，但與以上所舉亦復相類。其與商周銅器相異之處，則為用筆取材遠較銅器為自由。其與後世繪畫相異之處，即全用細線鉤成。所以從戰國到晉，繪畫完全是一個系統。

漢代石刻畫象最早的為元鳳時鳳皇畫像，其次為朱鮪祠堂畫象。元鳳鳳皇畫像雖然遠不及朱鮪祠堂畫象之工巧，但用筆與刀法則互相類似。其特徵即為先畫在石頭上，以後再按照所畫的筆迹刻上。其較後者如皇聖卿石闕及武梁祠，上石以後，並不照畫象之筆迹刻上。而在鉤出的畫面刻下去成為陰文之畫面，則如皇聖卿闕；將鉤出的畫面留出，在畫面四周鑄刻，成為陽文之畫面，則如武梁祠。此當然在技巧上是一種進步。現在所發現的漢畫大都屬於後兩種之辦法，惟有李翁五瑞圖，時代雖晚而鑄刻之方法與元鳳畫像及朱鮪畫像相同，則大抵因為畫面太大，又在下臨百丈之摩崖，不易施工之故。(註二)

(註一) 商代銅器主要的花文，為鳥獸形，而雜以雷文(殘鼓為本所發現，曾列美展)。自然是先有雷文而後將鳥獸形裝飾上去的。所以鳥獸形要遷就雷文，因此得不到充分的發展。本所在安陽，城子崖，諸城所得的黑陶，其粗者則為布文，其精者則為類似雷文的花紋，作成一個一個的panel印上去(尤以劉耀祈延需兩先生在諸城所得為顯著)。則其脫胎於布紋為近，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說謂古者陶器以手製，其上多印有指紋，其後仿刻之而成雷文，似不合也。黑陶有兩鼎廟等，形狀與商周大同，其圖案當然為商周銅器圖案之前身。

(註二) 畫象雕刻分類，參照關百益南陽畫象集王獻唐山東圖書館藏漢畫石刻考釋跋。

朱鮪石室畫象之著錄始見於沈存中夢溪筆談，其卷十九云：

『濟州金鄉縣發一古塚，乃漢大司徒朱鮪墓，石壁皆刻人物祭器樂架之類。人之衣冠多只有如今之幘頭者，巾額皆方，悉如今制，但無脚耳。婦人亦有如今之垂肩冠者，如近年所服角冠兩翼抱而下垂及肩，略無小異。人情不遠，千餘年前冠服已當如此，其祭器亦有類今之食器者。然其所言恐僅賴傳聞，非由目驗，故翁覃溪謂以畫像驗之，與夢溪所言不相合。自此以後，傳世轉希。金石著錄家殊少言及之者。畢沅作山左金石志時尚有二十五石，清季多遭散佚，僅存十五石。且多傳拓不精，故葉昌熾語石言殘泐已甚也。阮元小滄浪筆談三則謂：

今以石本驗之全與武祠諸刻異。其中人物衣冠蕭疏生動，頗類唐宋人畫法，或是扶溝後人追崇先世而作耳。殊不知朱鮪墓明見於水經注，縱晚亦不至到唐宋。至所言人物衣冠蕭疏，則樂浪營城子諸畫已是如此，尤不得謂爲晚出。蓋鐫刻苟簡，反保存原畫神理獨多，固非晚出之證也。今試將朱鮪石室人物填實，則大類武梁祠，將武梁祠雙鉤，亦與朱鮪石室相似。二者固不可以工拙衡之。其實武梁祠神采奕奕，亦不得指爲不生動也。（孝堂山石刻大類武梁祠，然續得石所繪之龍，即與朱鮪石室及五瑞圖相類，此亦刀法不同影響畫面之顯例也。）

二 畫象中之人物

（一）宴會

後漢書趙岐傳『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臧，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頌讚。勅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卽日便下，下訖便掩。」』蓋已至從儉薄，然猶爲畫像，可知漢代畫象之事盛極一時。其圖繪古人各分賓主，亦大致從當時俗習。今案諸石中大率皆有宴會賓客之畫象。朱鮪石室幾全爲此事，惜次序無從排列，故不能恢復原狀。然其大體，猶可推測。其中題朱長舒三字之石，大抵卽爲朱鮪畫象，餘當爲其賓友也。更有數幅畫婦人，蓋其家屬，故以物間之，其間之者當卽屏風。

屏風見後漢書宋弘傳，（見前引），又漢書陳萬年傳『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亦指此。（爾雅釋宮：『容謂之防』注：『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郝氏考如今之圍屏，則屏風亦即今之屏風矣。）其執爨者之用具有盤盂瓶勺，形製與當塗及和縣所得晉器略同，（註）而與殷周所用鼎鬲簠簋之屬大異。可證飲食器至漢而大變，繪畫之方法亦從銅器之鑄而移為漆器之繪。因之用筆亦大相殊也。

宴會之事又見於武梁祠前室第七石及前室第十四石，其用具惟有一敦略同戰國時器，其餘無不與古彝器異趣。案壽州楚器當楚之將亡，然其用器種類尚多，且多為金屬。及漢時則天子殉葬之器多用陶瓦，雖可以從儉解釋之，然器形之與古相殊，不得謂為非鉅變也。後漢書禮儀志大喪明器云：

卮八，牟八，豆八，簠八，形方；酒壺八，槃匱一具，瓦竈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槃十，瓦酒樽二，容五升；匏勺二，容一升。

其平民殉葬之物，如王盱墓所得者（見樂浪所載），為漆杯，漆盤，漆盂，漆盤，漆匕，漆勺，漆壺，瓦甕，瓦盃，瓦壺。其見於樂浪王光墓者則有瓦甕，瓦罐，漆案，漆盤，漆杯，漆勺，漆盂，漆奩，漆匣，等物。較天子殉葬之物為尤簡矣。案漢天子殉葬之物，惟盤匱猶存古制，此則並匱而無之。（營城子漢墓中有所謂獸形瓦器者，似為匱之變體。然有四足，若為溫水之用，則水過溫，不能如前代之奉匱沃盥矣。故當是以匱注於盤盂者，此僅存奉匱之過渡形式。推之食器，則由簠簋變為盃，亦同屬由繁而簡也。盃漢時稱為杯，見樂浪。）漢代食器由繁趨簡之原因，今難確知。或由古代彝器徒尚儀文，分門別類，並無實用，此等制度原不行於平民。今山川所出惟銅器為繁，其餘陶瓦遠不能及，可資例證。西漢君臣出身草莽，臨朝則拔劍擊柱，制法則漏網吞舟。叔孫所制雖有朝儀，其餘禮樂，文帝猶謙讓未遑，則古代彝器之鑄置應用，當然日就遺忘，可以

（註）當塗器見本所集刊三本三分徐中舒先生當塗出土晉代遺物考，和縣出土各物現亦歸安徽省立圖書館保存，與當塗出土者同類，惟種類較多，且稍完整。

想見。上行下效，至武帝時已積六七十年，習尚已成，孰願以禮施於晏居以自縛，此或漢制遠異前代之最大原因歟？

（孝堂山第十石及武梁祠前石室第三石第十四石左石室第九石皆爲宴飲之事。大體皆作樓形，婦人處其上，男子及賓客居其下，庖廚居其旁，車馬列其外。大抵高冠而偉服者皆主人及賓客，其幘而不冠者，則蒼頭之流也。（註）故客見主人長揖而不拜，而蒼頭則俯伏其下（見左石室九及孝堂山第十）。至主人之位則或左或右初無定向。蓋武氏祠牆壁方位今已失考，無從辨別東向西向以西方爲上，南向北向以南方爲上之意矣。其猶有可辨者，則武氏祠主位大抵在左，而孝堂山主位皆在右，此或者武氏祠爲宴賓友，故主人在下位，而孝堂山則不然歟？按漢代守長於部屬有君臣之分，故太守府亦可稱朝。顧炎武日知錄二十四上下通稱條云：

漢人有以郡守之尊稱爲本朝者，司隸從事郭究碑云，本朝察孝，貢器帝庭，豫州從事尹宙碑云綱紀本朝是也（原注，三國志孫皓傳注邵晞爲會稽郡功曹自言位極朝右，晉盧諶贈劉琨詩謬其疲隸授之朝右，李善注朝右謂別駕也）。亦謂之郡朝，後漢書朱寵傳，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是也。亦謂之府朝，晉書劉琨傳造府朝設市獄是也（原注時琨爲并州刺史）。亦有以縣令而稱朝，晉潘岳爲長安令，其作西征賦曰勵疲鈍以臨朝是也。

今按武氏三君仕不過執金吾丞，西域長史，州從事，原皆爲人部屬，不得臣吏人，則其宴會時自居主位當無疑義。孝堂山決非郭巨祠，（此事當另有辨正，阮元小滄浪筆談三有考證，甚確，可參看。）依隸續所稱則或當爲朱浮祠堂，或當爲仲家祠堂；若爲朱浮祠，則朱浮固久爲府主，若爲仲家祠，今雖不知其歷官如何，然能自居上位而賓客多人來朝，則必曾歷牧守，始可如此也。

（註）諸石冠制亦自不同，如武梁祠之夏桀，吳王，齊桓公，魯莊公，齊王，秦王，韓王，慶忌之冠，前有展簪，殆即通天遠遊之屬。而管仲，趙襄子，使者，縣功曹，魏湯，孝孫，朱明，范睢之冠，前高後低，蓋進賢冠。左石室第八石成王未冠，蓋因年幼之故。其婦人首飾，則步搖也，詩稱『副笄六珈』即此，以上並見續志。衣皆有緣，與殷制同。婦人衣皆曳地，且或有着深衣者，如清喬松年所說。

（二）都試及戰爭

武梁祠前石室及後石室均有攻戰圖，然詳核之，或是都試。惟孝堂山第三第四石或爲攻戰。蓋分列部伍，矛戟相搏，前列騎兵，後藏步卒，自來說者認爲攻戰之事。（羅振玉雲甌漫稿與友人論古器物書謂爲大狩之圖，其說若確，則亦非攻戰也。）然其兵器不出矛戟弓矢，而尤以弓矢與戟爲多，蓋漢代戟行而戈廢矣。

漢書 鼂錯傳云：

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丘川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荏葦竹箭，草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鉞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

以上所言，漢之兵器，惟弓弩，長戟，劍楯，矛鉞。今此畫劍楯而外，大率皆有（劍楯又見於武梁祠，此特失畫耳，非漢無有也）。而上古常用之戈，則既不載於鼂錯傳，亦不見漢畫，則此物在漢久已不通用，已可證明。

又諸兵器之中，弓弩似爲尤要。申屠嘉傳『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羽，遷爲隊率』注『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踏彊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李廣傳『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爲郎，騎常侍。』此皆以善射而達者，其善擊劍用戟者無聞焉。此風至唐尚然，舊唐李抱真傳『抱真密揣山東當有變，上黨且當兵衝，是時乘戰餘之地，土瘠賦重，人益困，無以養軍士，籍戶丁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吾當會試，及期按簿而徵之，都試以示賞罰，復命之如初，比三年則皆善射，抱真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內鄉得成卒二萬』；此雖後代史料，然紀載差詳，亦足徵弓弩之用較大也。

武氏祠繪武事者有前石室第六石，後石室第七石，後石室第八石，第十石上部；後石室第八石第十石上部已漫漶，第七室大致與前石室第六石同，但少題識耳。故其所表現事實應從前石室第六石考之。第六石上部題尉卿車，（註）按漢代九卿

（註）中指尉卿爲縣尉，然縣尉與武氏諸祠無與，且縣尉四百石至二百石，車不得施轡絡，而功曹亦不能爲縣尉前趨也。

中，惟衛尉及執金吾（中尉）有尉號，則尉卿舍此二者莫屬。然武氏諸人惟武榮曾爲執金吾丞，無人爲衛尉官屬者，則此尉卿當卽執金吾（且人大村西崖支那美術史雕塑篇從前室諸題識中考得歷官多與武榮合，因指前石室爲武榮祠，此亦前石室，尤可與此互證也）。執金吾之職，據北堂書鈔設官部引應劭漢官儀云：

執金吾屬官府武庫令丞從騎二百人，持戟（續漢志注脫此二字）五百二十人，輿服導從，充滿道路，羣僚之中斯最壯矣。中興以來，但專徼循，不與國政。可知執金吾之職實未嘗與戰爭之事，東京一代亦未聞執金吾出征者。馮雲鵬金石索『碑畫車騎戰士，題官名而不載人名，疑當日武氏有軍功者，故書於壁，今不可考。如武班碑云「瘡吏士哮虎之怒，薄伐（缺九字）百姓賴之，邦域以寧」，可見矣』之論，殊未足據也。

執金吾都試士卒，史無明文，然既有兵，卽當練，執金吾之緹騎與光祿勳之羽林，同爲徼循守衛，光祿勳之職，據漢書霍光傳云『歲都試郎羽林』，則執金吾按理自亦當都試緹騎也。然其所領亦僅緹騎而已，上引漢官儀可以證明。前人言兵制者若錢文子補漢兵志，馬端臨文獻通考，王應麟玉海，陳樹鏞漢官答問，考訂西漢初年兵制，南軍屬衛尉，北軍屬中尉，尙稱精確。（註）然武帝時中尉既改執金吾，又設八校

（注）前人言南北軍制者陳樹鏞最稱詳贍，然亦失之強勉。漢官答問云：『錢文子補漢兵志云，北軍在未央北爲軍壘恆，置中壘校尉，以一校守之，此則大誤也。百官志明言中壘校尉掌北軍之壘門，非掌北軍也……蓋北軍自是中尉所掌，而京師重兵實在於此，不敢盡寄其權於一人也，於是設監軍御史以監之（監軍御史見胡建傳，又曰監北軍使者，見劉屈氂傳），又未已也，又設中壘校尉以掌其壘門，又未已也，時使重臣領其兵。』按中壘官階與列校同，謂北軍諸校全爲中壘所掌固誤，然百官表明云『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既曰『掌壘門內』，當然非僅掌壘門可知。陳氏力言中尉始終掌北軍，故有此失。其實北軍武帝時已分，而營壘早已興建，不能分屬諸校。故專設中壘校尉以掌之；又因事太簡，故使領與營壘無關之西域，其執金吾之中壘令，雖名仍舊，大抵另掌他事矣。光武移洛陽，北軍非故營壘，故不設中壘校尉也。

分領禁卒，則八校久與執金吾不發生從屬關係。（註）其中城門校尉多以大臣領之，至開幕府得舉吏（陳樹鑣所考），自非執金吾所能領屬；至射聲乃新募待詔射聲士；越騎，長水，胡騎，則哥薩克式禁軍，尤與中尉無干；惟屯騎（騎士），步兵，虎賁（輕車）三校原為中尉之兵，並中壘不過八校之半而已。雖至東漢尚沿文帝時北軍之名，實非文帝時北軍之舊也。漢書百官表及後漢書百官志皆列諸校於司隸後，明示與司隸同等，其意甚明，前人非不知此，特必欲統一代之制而言之，失之固矣。

前石室第六石下段蓋亦為都試之事，後石室第七石略同，但無題榜耳。所繪者大抵為太守之事，因所題官職皆太守部屬也。其官名有功曹（續志太守無東西曹有

（註）列校自武帝設立後即直屬禁省，同於九卿，唯官階較小而已。其為中壘校尉者有劉向 劉歆及丙吉 少子高，為列校尉者有匡衡 子昌，淳于長，金安上 孫饒及參，甘延壽，陳湯，班況，丁宣，張安世 孫放，又張氏以得幸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後漢有來歷，賈宗，鄧嗣，耿國，耿夔，岑遵，竇章，趙代，梁冀，桓郁，桓焉，劉愷，班超，班雄，馮緄，竇武，崔烈等。又後漢書劉般傳，『時五校官顯職閑，而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以宗室肺腑居之，每行幸郡國，般常將長水胡騎從。』是為列校尉者，皆宗室，倖幸，功臣，外戚，及大臣子孫，皆天子近臣，惟爰延以儒學為之，然亦重任，若孔安國之為侍中也，故事實不必由執金吾轉達天子。夫既領禁兵，又可直達天子，當然不屬執金吾矣。尚書名屬少府，事實上尚已獨立，況此名義即不屬執金吾乎？至東漢之手權歸宦官，五校即實際入宦官之手，陳寶之事，宰相大將軍尚不能指揮，無論執金吾矣。

故武帝以後京師兵制大略如下：

南軍——屬衛尉

北軍——屬列校尉

虎賁羽林中郎將——屬光祿勳

不屬南北軍者——緹騎——屬執金吾

城門兵——屬城門校尉

功曹)主簿(朱博傳爲琅邪太守，使主簿教贛拜起聞乃止)，賊曹(續志諸曹略如公府，太尉府有賊曹，又見朱博傳)，主記(續志主記史主錄記書催期會)，游徼(續志鄉置三老游徼，游徼掌徼循，禁司姦盜)。大抵賊曹游徼司姦盜，故掌武事，其功曹主簿主記，則都試時記其殿最者也。然東漢無都試，續志具有明文，此顯爲都試，頗可異，若解爲戰爭，則太守官屬車馬充滿全幅，敵人將誰屬乎？且軍服當短衣大袴(參見王國維胡服考)，此寬衣博袖，儒冠偉服，何以言戰乎？蓋後漢廢都試及民兵，續志雖有明文，然後漢實屢發民兵，有時且由州郡官統率，未必能盡廢也。(註)如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爲建武七年事(見光武紀)，而至建武十一年即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皆會荊門擊蜀(見岑彭傳)，則民兵亦不能終廢(杜詩請置虎符，亦七年至十四年時事)。終後漢之世不惟擊匈奴西羌南蠻常發州郡兵，且騎士之制尚在，皇甫嵩傳『黃巾起……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雋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雋各統一軍』，是其證。既有騎士，則性質相同，以地理需要不同，而分類別之材官樓船，當然仍有。漢代民兵之制，大抵若現在日本之在鄉軍人，選一部分壯丁，教以武勇，有事則招集，故有材官騎士之稱。邊郡有民兵，證之後漢書本文及新發現簡牘，其事應無問題。三河不當邊郡，至後漢末尚有騎士，可證內地都試之事亦在。特後漢因省費而罷都尉，且光武時曾一度罷民兵，司馬彪遂將後漢初年之制，認爲一代之制，後世盡承其說，於是後漢無民兵，幾成定論矣(罷都尉非即罷民兵，蓋其事並於太守也)。殊不知光武建武七年罷民兵之理由爲『今國有衆兵，並多精勇』，此後與光武初起之兵漸歸解散，而州郡又未聞有募兵之制，則無兵之國何以維持？祇以山東『光武以來，中國無警，百姓優逸，忘戰日久』(後漢書鄭太傳)，雖有

(註)後漢州郡兵實未罷，其後山東討卓，州郡割據，在在均可爲證。至晉武平吳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而已(晉書山濤傳)。因此劉石蹂躪州郡，曾無藩籬之固(文選于寶晉紀總論)。若在東漢，除朝廷有計畫而棄涼州外，固無蠻夷內叛，不能捍禦之事也。

都試，漸成具文。若全無都試之事，則武氏祠所圖，將全無所指矣。（若非都試，非戰爭，而爲捕盜，則功曹，主簿，更何用者？）

田高賢對其，文森贊世，禽類不視人（三）故事

漢代壁畫多爲故事圖畫，固不僅墓室祠堂爲然，前引漢代諸書涉及圖畫者，蓋凡宮室之壯麗者莫不以圖畫爲飾。墓室祠堂之石刻，即摹仿宮室而然，故其題材亦大同宮室。其故事之範圍大率爲賢君，暴君，忠臣，孝子，義士，烈女，及於神怪，前所引諸書已可窺其大略，今更引漢魏賦二篇證之如次：

圖畫天地，品彙羣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闢，遂古之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伏羲鱗身，女媧蛇軀，鴻荒朴略，厥狀睢盱。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殊。上及三后，嬀妃亂生，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敘。惡以誡世，善以示後。

文選二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命共工使作績，明五采之彰施，圖象古昔，以當箴規，椒房之列，是準是儀。觀虞姬之容止，知治國之佞臣；見姜后之解佩，寤前世之所遵。賢鍾離之讜言，懿楚樊之退身；嘉班妾之辭輦，偉孟母之擇鄰。文選二何晏景福殿賦。以上兩篇曾爲容庚先生所引。

據此，則畫像之意，不惟爲觀美，且爲『惡以誡世，善以示後』，『圖象古昔，以明箴規』。是所繪者即漢人之標準道德，其深入人心當然較著於文字者爲尤勝。

故漢人之道德觀念，悉可從圖像推之。畫像之事早自戰國，而其範圍之廣，從帝王宮室，迄於廟宇，官署（後漢書西南夷傳），甚至及於郡縣卿亭（後漢陳紀傳及後漢紀），而富有平民亦復效爲之（鹽鐵論散不足今富者雕文鏤脩，聖憂壁飾…黼黻帷幄，塗屏錯跗，中者錦綈高張，采畫丹漆。所謂聖憂壁飾，壁之采畫也，塗屏錯跗，屏風之采畫也。雖未言爲人物，然以前引諸則證之，當然多爲人物，證之今存諸石刻，益可信其然）。其所畫事蹟，愈陳陳相因，則其標準愈歸於一致。

標準既定，則時人藉其評騭是非，自不能免，觀前引楊惲班伯之事可以證明，而趙充國傳稱成帝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召黃門郎揚雄卽圖畫而頌之，此亦評騭之類也。（應劭傳，「初父奉爲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劭乃

連綴其名，錄爲狀人紀，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亦其證）。此風既開，當然非演成東漢之尙氣節重評論不可。趙翼廿二史劄記東漢尙名節條謂『自戰國豫讓聶政荊軻侯嬴之徒，以意氣相尙，一意孤行，能爲人所不敢爲，世競慕之，其後貫高田叔朱家郭解輩，徇人利己，然諾不欺，以立名節，馴至東漢其風益盛。蓋當時薦舉徵辟，必採名譽，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以赴之，好爲苟難，遂成風俗。』其言雖得其大凡，然其蔽亦多。後漢之尙名節自是與游俠有相共之處，然決非僅游俠一端，所能影響。至謂由薦舉徵辟，亦見其偏而不見其全。蓋游俠之風，盛於戰國，至於西漢已成弩末，觀班固所紀游俠，不過爲權門鷹犬，若與史公所紀相比，立見真偽懸殊；若謂全由游俠，則游俠向不容於世主酷吏，其風漸泯，決不能後漢反盛也。至謂由於薦舉，則亦不盡然。試觀流離張儉，天下同迎，其所欲必有甚於生者，遑言利祿？且後漢一代隱逸之士多矣，其得大名者如黃叔度，郭林宗，鄭康成之流，皆爲處士。鄭康成戒子書自云：『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吾自忖度，無任於此。』此則利祿而外，應別有安慰身心之所。若謂此數子由時政不清使然，然果爲利祿，寧計時政？且嚴光，周黨，梁鴻諸人之不仕，豈乏明時？趙氏此意蓋承漢書儒林傳贊謂：『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使然也』之言。然西漢經學流弊，自由於祿利，東漢氣節，則虛名實利大半不能兼顧，安在其同於說經至於百餘萬言之流也。如薦舉而勵名節，誠有其人，然薦舉名節之世，亦由世俗尙名節而然；若世俗早棄名節如敝屣，則薦舉之事，便當私弊橫積，安得真以名節相尙乎？又安得權奸如竇憲，梁冀，董卓之流，亦以徵辟清流相尙耶？

蓋一代風俗之成，決非一二單純原因，所能率爾而解釋。游俠輕死，本封建遺風，其意氣相尙，一意孤行，乃其表現，非其原由也。豫讓，聶政固爲游俠者流，然田橫五百士，亦不得謂非俠者。其如此者，不知凡幾，則其事爲普遍風習，而非一意孤行矣。既爲普遍風習，則其事非僅由於好名，而由社會制裁不得不爾。其範圍普及全社會，非一二游俠之流，所能左右，後漢承其風，亦非其風益盛也。至於薦舉乃封建制度崩潰後之事，其例不勝枚舉，決不能使社會尙俠。且後漢之

尚名節，其行雖略同游俠，而其實質已混入儒家倫理甚深，而儒術之中，又早與道墨諸家匯流，故其尚名節決非前代某一種學說所能範圍；亦非僅以利祿所能解釋；此自後漢之時代精神。然其表現於圖畫者，則較為朴質而親切，若在後漢人之理論求之，則往往為門面語所掩，反不易見其真相矣。今將武氏諸祠所有諸石，分其類別，以示一斑：

(一) 古帝王

伏羲女媧 祝誦氏 神農氏 黃帝 顓頊 帝侖 帝堯 帝舜 夏禹 夏桀

以上并見武梁祠

(二) 孝子

曾子 閔子騫 老萊子 丁蘭 三州孝人 羊公 魏湯 孝烏 孝孫 柏榆

邢渠 董永 章孝母 朱明 金日磾 以上見武梁祠

伯游 見前石室

(三) 義士

李善 柳惠 程嬰杵臼 以上見武梁祠

顏淑 侯羸 朱亥 范贖 靈輒 以上左石室

(四) 刺客

曹沫 專諸 荊軻 要離 豫讓 聶政 以上見武梁祠

荊軻 見前石室

(五) 列女

代趙夫人 梁節姊妹 齊繼母 京師節女 無鹽醜女 鍾離春 梁高行 秋胡妻

義姊妹 楚昭貞姜 以上見武梁祠

齊義婦 秋胡妻 前石室

王陵母 左石室

(六) 縱橫

蘭相如 范雎 以上見武梁祠

(七) 隱逸

何饋（註） 何匱丈人 以上新出一石

論語：『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此儒者之標準人格也。然所求不外尋常日用之間。後漢所崇拜希冀者，除曾閔之孝而外，大體皆非常人所能者。務希特立獨行以震驚流俗，雖偏頗不顧，蓋已迥非儒者中庸之道。至所舉列女，亦復各有特殊之個性，迥異後世正史方志之列女傳中千篇一律無事蹟可言者，則後世所謂節烈，皆庸言庸行，亦不足與漢世所希求者比矣。

漢代表彰忠臣孝子者儒術也，表彰何饋何匱則非儒術而爲黃老之風，表彰蘭相如范曄則又縱橫之習，而刺客義士列女則又爲游俠之行，此皆武氏諸祠同所表彰者也。按復仇之習後漢甚盛，人復從而贊美之。於是在後漢書屢有所載。其在前漢雖民間或多復仇，然朝廷尚法，不能容人輒有報仇之事也。漢書朱博傳：

遷琅邪太守……姑幕縣有軍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閣。博迺見丞掾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除如律令。』王卿得勅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驚。十餘日間捕得五人。

蓋西漢尚法不重情。復仇之事於法不能曲恕，郭解之誅亦以此也。後漢初年桓譚尚極言復仇之非，後漢書桓譚傳云：

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法，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其家屬於邊。相其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

（註）何與荷通，何天之龍即荷天之寵也。饋論語集解作蕢，故釋爲草具，此作饋，故畫作執食器形。然草具亦是食器，見范曄傳，孔疏誤耳。

然此事至後漢之季，則持清議者迥異於前，後漢書蘇章傳：

章……兄曾孫不章，……父謙，初爲郡督郵，時魏郡李暲爲美陽令與中常侍具瑗交通……及謙至部案得其臧論輸古校。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私至洛陽。……暲爲司隸校尉收謙詰掠死獄中，暲又刑其屍以報昔怨。不章……與親從兄弟潛入廡中，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暲之寢室，出其牀下，值暲在廁因殺其妾，併及其小兒。……徑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伍員事參見公羊定四年傳及注）。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強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悍之衆，雪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屍以舒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子立，靡因靡資，強讎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宮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章毀身憊慮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爲報已深。況復分骸斷首以毒生者，使暲懷忿結，有得其命猶假神靈以斃之也。力唯匹夫 功隆千乘，比之於員，不亦優乎？』於是議者貴之。

此其論議固與東漢初年之桓譚不侔矣。蓋儒術東京最深入於世俗，然愈遍於世俗，則其世俗化亦愈深。雖報仇者在法仍有重罪（見申屠蟠傳鍾離意傳）。然郅惲，趙憙，魏朗，陽球亦皆以此知名，此所謂『俗稱豪健』，不得不然。然由此可知漢人好圖畫荆軻聶政之故矣。

其次爲隱逸，隱逸之思想出於道家，儒者『三月無君則弔』，不尙此也。漢初期儒家如轅固之流，力匡黃老，然世俗則爲黃老與游俠所雜糅之思想。案之理論，黃老與游俠應背道而馳，而在事實上所表現，則黃老學者即多爲游俠之實行者，如張良（治黃帝老子之術，門多長者車），田叔（學黃老於樂鉅公，爲人廉直喜任俠），淮南王安（養士，爲黃老言），汲黯（學黃老言，常慕傳伯爰益之爲人，善灌夫鄭當時），鄭當時（以任俠自喜，好黃老言），耿況（字俠游，學老子於安丘先生）諸人皆是，此蓋黃老乃『家人言』而任俠乃『家人事』之顯證也。然此特漢代初期之事，及後儒家雖在政治上定於一尊，而在學術上黃老之學早已混入儒家。始則孔子見老子之事公然見於先黃老而後六經之太史公書，繼則昭帝時之賢良文學

公然舉孔老以對抗稱管商之大夫御史。更後則號爲儒生，實兼老術，如魏相有『軍旅之後必有凶年』之語，鄭均少好黃老書，翟酺四世傳詩，好老子，張純慕曹參之迹，范升習梁丘易及老子，張霸博覽五經而據老子『知足不辱』之言以上病，皆其事也。甚至出身太學以儒術稱之光武帝與戚宮之詔，亦公然行黃石公記『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之言，則儒生早不以黃老爲諱，此東漢重隱逸，魏晉談名理，固有一貫相承之事矣。

三 畫象中之名物制度

(1) 車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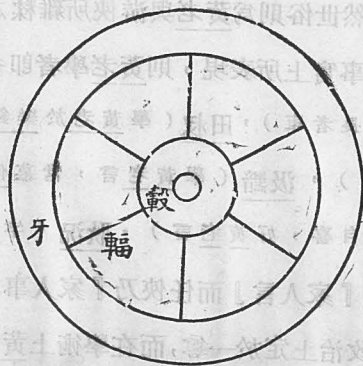
古代車制今所存者惟考工記言之較詳，雖非漢制，而漢制實出於此。今先考工記所言之大略，更以漢制比較之。

一 車輪

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考工記

按周尺略同劉歆銅斛尺（隋志），合今市尺六寸九分。六尺六寸合市尺四·五五四尺，六尺三寸合市尺四·三四七尺。

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同上
所以貫轂者謂之軸，軸末謂之害，……害上鍵謂之臺（臺謂之輪）。——阮元
車制圖解。



阮元車制圖解曰，考工記曰擇其漆內而中諱之以爲轂長，擇者橫充物內而

以其廣之半爲式之崇，是式長與廣等崇於三尺三寸，其兩旁居轆板上，則須揉治而誦之，一在前卽式深，二在後卽轆深也。……蓋輿左右木板通謂之轆，參分轆隧，一在前，二在後，後高於前式二尺二寸，轆通高五尺五寸也。

輓——阮說卽車耳，未詳，辨見後使者車節。
軌——阮曰軌之爲物蓋在輿之前軫下正中，略如伏兔，爲半規形，以圍軾身。將輿與之力在後軾則有任正以持之，在前軾則有軌以衡之。故左右轉戾不致敗折。……故記曰環澇自伏兔不至軌七寸，考伏兔至軾一尺四寸許，環澇七寸居其半，餘七寸始至軾，軌當與軾寬等三寸許，與環澇尚離三寸許。故曰不至軌，此由外而數至內也。記又云軌中有澇謂之國軌，案軌在輿前，人所目見，若環澇在輿底，目不及見，故須察之，此由外以觀內也。合此二者，其地確不可易如此。

陰——詩小戎曰陰韜蓋轅，毛傳曰陰揜軌也，箋曰揜軌在式前垂軌上。旣曰揜軌則非軌，而爲式下板，當卽車前板也。

三 轆

曲轆——轆。轆繇軌以上爲侯（侯謂之頸），轆後投任正謂之踵，當伏兔者謂之當兔，轆兩端木爲任木，前端駕馬爲衡正，後端持輿爲任正。……衡（鬲）下扼馬牛者輓，……衡下兩輓曰兩輓。——阮元車制圖解。

考工記曰『轆人爲轆，轆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轆深四尺有七寸。』

鄭注『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軾崇三尺有三寸加軾與轆七寸，又並此轆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也。鄭司農云深四尺七寸謂轆曲中。』又云『田馬之轆深四尺。』

注『田車軾崇三尺一寸半，并此轆深而七尺一寸半，今田馬七尺衡頸之間亦七寸，則軾與轆五寸半，則衡高七尺七寸。』又：『駕車之轆深三尺有三寸。』注『輪軾與轆大小之減率半寸也，則駕馬之車軾崇三尺，加軾與轆四寸，又并此轆深，則衡高六尺七寸也，今駕馬六尺，除馬之高，則衡頸間亦七寸。』

阮氏曰記曰國馬之轆深四尺有七寸，鄭注曰衡高八尺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頸衡間也。記又曰軌前七尺而策半之，鄭注曰謂軌以前之長

也。據此則鄭意以轆深四尺七寸，爲轆端直垂下與軛平處之高得四尺七寸，除輪半崇及加軛與轆之四尺不入算也。且以軛前十尺爲轆身之長也。夫使軛前十尺爲轆身，則轆身不能無撓，其撓之數，經無明文，於是又意爲解曰凡弓引之中參揉轆之倨句中二可也。中二卽三分損一耳，卽十尺之曲轆參分損一得六尺六寸六分之直弦，再以轆深之四尺七寸爲句以求其股，則股長四尺三寸三分有奇，即使服馬尾近着陰板之前，而轆端之衡，已近居馬脊中矣，有是理乎？……且卽以十爲弦，四尺七寸爲句，得八尺零八寸有奇之股，亦尙不足爲驂馬地也。……此皆由誤解記文之故。……元案記曰軛前十尺，此自軛前直引至轆端長十尺也。……記文一曰凡轆轆欲其孫，而無弧深，再曰轆深則折淺則賁，深字皆指曲中而言，是所謂深者乃曲中之度，必非轆垂下之高明矣。今以通徑求外周以定轆身中心之長，考轆身有圓卽有徑，求記者之意其轆身當以徑三寸入算，何也。蓋以此三寸合之四尺七寸，共深五尺爲半徑，合通徑十尺，適得平圓之半，圓形不差分釐也。又轆身既有圓徑之三寸，則當有胸有贏，今以軛前十尺內減兩端，轆身徑共六寸，餘九尺四寸之通徑，合四尺七寸之半徑求平圓半周得十四尺七寸六分五釐四豪，此轆身胸數也。若並轆兩端身徑在內爲軛前十尺之通徑合轆身三寸，于深四尺七寸爲五尺半徑，求平圓半周得十五尺七寸零七釐九豪，此轆身外背之贏數也。既得贏胸二數，再以二數通徑相減，爲九尺七寸之通徑，合四尺八寸五分之半徑（適當轆圓之中心），得平圓半周一丈五尺二寸三分六釐六豪，此轆身中心之長也。

按兵車乘車軛崇三尺有三寸，加轆深四尺七寸，應適爲八尺，故衡高卽馬高也。蓋衡之底適接馬脊，中雖有軛，然繫馬在軛兩旁，其中部在衡與馬脊之間甚微，不得多至七寸。至軛雖在軸以上，然亦在轆以上，不得在轆軸之間更加軛數。轆與轆平，其數更無從加入也。鄭注此處微有疏失。

阮氏釋轆之處，惟『軛前十尺，此自軛前直引至轆端長十尺也』之論爲得其大約。然不若程瑤田謂『軛前十尺，謂自軛平指至轆端下之度』爲較愈也。

蓋阮氏所設計之轆形爲半圓。若其圓徑與地面平行，則馬之高，非與軛崇相等不可，卽馬非僅高三尺三寸不可。若轆端與馬頸同高，（馬高八尺，當卽指馬頸高八尺，若僅照阮氏所云以六尺爲度，則輪崇六尺六寸，較馬頸爲高，馬將不勝車矣），則馬頸至軛，仍僅得八尺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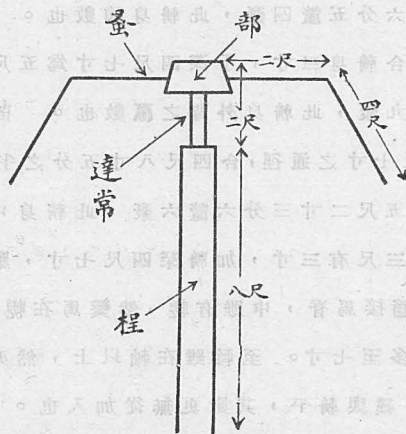
八寸如阮氏所求之數，仍不足爲驢馬地也。大抵古輶形仍當如漢畫所繪，（采桑斂車之輶形仍作直形，不作弧形，則戰國時輶亦不甚曲，如阮氏所云也，西洋上古之車以及現在之馬車均有輶，然亦無作半圓形者），自軌前引更斜曲而上，直至馬頸，若作半圓不惟於理不通，且與記文『凡輶輶欲其孫而無弧深』亦不合，蓋從此句可知深者從軌所引之平行線直上而言，亦即鄭氏所謂高，若作半圓，是即『弧』矣，安得曰『無弧深』乎？戴震略同鄭氏，無所發明，故不論。程瑤田論輶之度甚是；然謂『輶在輿下者曰任正，軸在輿下者曰衡正』則非矣。

四 蓋

車蓋之杠謂之桎，蓋斗詁之部，其柄謂之達常，隆屈謂之弓，弓近部謂之蚤。

——戴震考工記圖

考工記曰輪人爲蓋，達常圖三寸，桎圖倍之六寸，信其桎圖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桎長倍之四尺者二……弓長六尺謂之底輶，五尺謂之底輪，四尺謂之底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圖去一以爲蚤圖，……是故蓋崇十尺。



車制之大略如此，爲求簡故，與車制有關之引證，力從刪落，然已累篇牘如右，蓋太簡則不明也。今更以漢制證之如下。車制之見於文籍者，大略可分下列各種：

（一）兵車

（二）使者車

不敵而車(三)輜車 魏志田豫傳武王嘗言，輜車輜車輜車輜車。謝則至竟

輜車者。(四)安車。宋書謝靈運傳謝靈運以輜車為安車。(志與宋書)輜車

(五)牛車

【兵車】即考工記之小車，然不常見於漢畫，蓋戰國時即已漸不通用，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其尤著者，戰國時千乘之國，萬乘之國，不過代表大國小國而已，非真有千乘與萬乘也（見狩野紀念論叢日本人所考）。至漢則記兵車之事尤鮮，霍去病傳『大將軍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武剛車據續輿服志云有蓋有帷（兵車無之），蓋用作自環為營作障礙物，與鹿角同，非駕駟馬以衝鋒陷陣也。公孫賀傳『為輕車將軍出雲中』，然所領者並非輕車，西漢列校中虎賁校尉尚有掌輕車之名，至東漢則因無所用之而裁去矣。大抵在漢以前戎車尚用於兵事，至漢以後，則戎車僅用於運輸及作障礙物而已。後漢南匈奴傳『光武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時人見之，或相謂曰：「識言漢九世當卻北狄地千里，豈謂此耶？」其後果拓地焉』。是所用者乃用以瞭望之牛車，仍非戰車（後漢書楊璇傳，璇嘗用戰車，然先以石灰使敵不得視，仍屬用奇兵，非恃車也）。至續輿服志之輕車戎車，僅為天子出行壯威儀而已。此後用作發石攻城及障礙之用者，例如：

魏志袁紹傳袁紹在土山對曹公營度石擊，紹樓皆破，紹衆呼為霹靂車。

魏志郝昭傳，諸葛亮圍陳倉，又使人說郝昭不下。昭兵纔千餘人，亮進攻之。雲梯臨城，昭以大箭逆對其梯，又以繩連石磨其衝車，衝車折。

魏志田豫傳，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為，豫因地形迴車結圓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隙，胡不敢犯。

此皆與古兵車之用相殊。用兵車而得利者惟劉裕攻慕容超事：

宋書武帝紀，乃退大軍，分車四兩為二翼，方軌徐行，車張幟，御者執稍，以騎為游軍。……比及臨朐，賊騎交至。帝用參軍胡藩策，襲剋臨朐，賊乃大奔還廣固。

此車之用雖似為作戰之用，其實仍用為障礙物。蓋其得勝，非由於車之本身，實利用車難進難退，可以相持，而乘隙以游軍襲剋臨朐也（劉風整傳『以牛車為櫓』，其用亦同）。是自漢以來車不能作為單獨作戰之用可知。至唐房琯用牛車作戰，

竟至敗績。宋徽宗時欲用戰車作戰，竟爲李復先沈括所譏，迄紹興造兵車而猶不能用（見宋史兵志），從此遂無能以兵車施諸戰陣者矣。故諸刻石所繪，皆鮮戰車，今所見惟孝堂山第三石而已。

車半（正）

【使者車】據續漢志云：

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督車，功曹車皆兩大車。伍百璫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從車四乘，無節，單導從減半。小使車，不立乘，有駢赤屏泥油，重絳帷，導無斧車。近大使車蘭輿，赤轂白蓋，赤帷，從駟騎四十人，此謂追捕考案，有所敕取者之所乘也。諸使者皆朱班輪，四幅，赤衡軛。其送葬白堊，已下，灑車而後還。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郊廟明堂祠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他出乘安車。今武氏祠及孝堂山所見主車，大抵皆大使車，因立乘而非坐乘也。然大使車駕駟，而畫像皆爲一馬者，蓋畫像從簡，畫一馬已可見其大略，不必畫四馬方知爲使者車也。使者者與從車不同之尤顯而易見者，在其有交絡，交絡者絡帷裳也，續志云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駕皆御金根加交絡，注徐廣曰青交絡青帷裳（絡並誤作路，今從陳景雲說改正，又續志『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若蠶，各乘其夫之安車，右駢加交路』，路亦應作絡），故知交絡與帷裳同施於車者；其後大行載車云『交絡四角』，意尤顯矣。後漢書劉盆子傳『乘軒車大馬，赤屏泥，絳襜絡，而猶從牧兒遨遊』；注『襜帷也，車上施帷以屏蔽者，交絡之以爲飾，續漢志曰王公列侯安車加交絡帷裳也』。故高車施絡爲顯者之制。（劉盆子所乘車亦非天子車而爲大使車。蓋天子車名路車不名軒車，說文軒曲輶藩車也，藩車即指有耳之車，段注云，左傳杜注皆云軒車爲大夫車，是軒車非天子車矣。赤屏泥絳帷見前引續志大使車節。）

武梁祠前石室之令車其車耳之制甚顯，（註）其制爲轎外更加橫板形物，直達式以前。續志云：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皐蓋，朱兩轎，其千石六百石朱左轎，轎長六尺，下屈廣八寸，上業廣尺二寸，九文十二初，後謙一寸，若月初生，示不敢自滿也，景帝中

（註）石刻諸使者車多有從騎，制見後書廉范傳。

元五年始詔六百石以上施車輻。

輻或謂之車耳（漢書景帝紀中元六年，應劭注曰，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屏翳塵泥也，……輻以簾爲之，或用革），或謂之輶（見前應劭注，又說文輶車耳反出也），或謂之簾簾（玉篇簾簾輶也），或謂之輶（說文輶車輶上曲鉤也，崔豹古今注曰車輶重耳也在車舉上重起如兩角然），或謂之藩（詩韓奕箋『簾藩，漆簾以爲車蔽，今之藩也』），其名雖異，其實則一。蓋以長六尺廣二尺之簾或革，施於輶外，當輪上者廣尺二寸，屈於下者廣八寸。因其在車兩側故謂之車耳，因其反出於輶外故又謂之輶也。阮氏車制圖考謂輶上反出謂之輶，非是，說文云『輶車兩輶也』，輶自輶之別名，輶爲木製方可倚，而車耳則應注及鄭箋明言以簾或革爲之；則車耳非輶，而爲輶外之物明甚。

漢制六百石以上，即縣令以上，方有車耳，然亦有特例。黃霸傳『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續志注引謝承書『孔恂字巨卿，新淦人，州別駕從事，車前舊有屏星，如刺史車曲翳儀式；是時刺史行部，發去日晏，刺史怒，欲去別駕車屏星；恂諫曰，「明使君傳車自發晚，而欲徹去屏星，毀國舊儀，此不可行；別駕可去，屏星不可省」，即投傳去；刺史追謝請，不肯還；於是遂不去屏星。』此州郡掾屬亦有車耳，然曰車前或式前，則車後無之；大抵僅有使者車車耳之半（因輶較式高，故輶可不障，而障式之兩旁也），因之不曰輻而曰屏泥或屏星也。至陳遵初除河南太守，乘藩車入閭巷過寡婦飲，則使者車矣。

武氏祠前石室第三石第四石左石室第九石後石室第七石其主車均有物若布帛垂於車後，案此即飛輶也。續志注『薛綜曰（乘輿）飛輶以緹油廣八寸長拄地，畫左蒼龍右白虎繫軸頭，二千石亦然，但無畫耳。』文選東京賦注引蔡邕獨斷『飛輶以緹紬廣八尺長拄地』。曲禮『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輶效駕』。注『盧云輶輶頭輶也，舊云車闌也。』是鄭注蓋從盧說。按車闌即車輶間橫木，此輶字別解；說文『輶車輶間橫木』，桂氏義證『車輶間橫木者，後漢書趙壹傳，張衡傳注引竝同，玉篇輶車闌也』，又尚書大傳『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輶』，鄭注『如今窗車也』，說文輶之重文作輶，與窗樞同意之故，以釋輶字本

不誤，惟以釋飛軻及釋禮記之展軻則不可耳。蓋君車法駕非窗車，不得有櫺，且車窗木闌亦不似緹油可以舒展，疏云『從車軻左右四面看視之，上至於闌』，乃曲解也。軻自漢以來即兼二義，故漢人釋飛軻者有時不免彼此牽強，然飛軻之制固在，續志所說自有所本。（宣紀：『太僕以軻獵車奉迎曾孫』，軻自當作櫺解，非飛軻也。車制之名往往兼二義，『軌』字亦然，見段玉裁集。）

【軻車】立乘大車爲大使車，立乘小車則爲軻車，車之大小由於馬數而不同，大抵四馬爲大車，而一馬二馬爲小車。平紀元始三年注引服虔曰『軻音遙，立乘小車也』；高紀五年注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軻傳』，皆是。因其爲立乘，故可四望，隋書禮儀志『軻車，案六軻一名遙車，蓋言遙遠四顧之車也』；釋名『軻車，軻遙也，遠也，四向遠望之也』。蓋軻車立乘與大使車同，均可遙遠四顧，後漢書賈琮傳『以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匝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大使車褰帷即可望遠，此即其證。惟大使車因加儀飾更有專名，其後乃僅以無專名之小立車爲軻車；若究其原始，則軻車本爲兵車所改（三書輿服志軻車古之時兵車也），兵車馬數多於二馬或一馬，則軻車之原義亦不當僅指一馬矣（軻車可駕三馬，王莽傳『巨毋霸軻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以大車四馬……詣闕』，鹽鐵論論儒『故軻車良馬無所馳之』亦非僅指一馬而言）。故軻車之準則，至爲無定，今依漢律定二馬及一馬立乘者皆爲軻車。如武氏祠中主車以外之導車及從車，武梁祠之閔子騫父車，前石室十石十一石之行亭車皆是。導車從車續志稱爲兩大車，大者對一馬之小車而言（二馬者單轡，一馬者雙轡，構造亦自不同），然既僅有二馬，按之漢律仍當在軻車之範圍也。至後漢晚期則軻車似專指一馬之車，書抄七十七引謝承書『許慶家貧爲郡督郵，乘牛車，鄉里號爲軻車督郵』。大抵督郵行亭應乘二馬車，與太守導車同，許慶只乘一牛，猶之一馬，故以軻車比附之，其實軻車非牛車，亦非專指一馬之小車也（史記季布傳索隱『軻車謂輕車一馬車也』，即據後漢俗稱，與漢律不同）。宋書禮志：『漢代賤軻車而貴輜，魏晉賤輜而貴軻車』，桂馥義證引晉制中書令乘軻車，傅暢故事尚書令軻車黑耳後戶，僕射但後戶無耳爲說，甚是，蓋輜指

凡衣車不論牛駕馬駕者皆是。晉代馬少，通用牛車（說見後），故一馬之輜車已爲貴矣。

【安車及輜輶】凡坐乘者曰安車，而有衣蔽者曰輜輶。禮記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適四方，乘安車』。注：『安車，坐乘，若今小車』。疏：『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此臣已老，故乘一馬小車坐乘也』。周禮春官王后五路有安車。注：『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續漢輿服志：『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駕皆御金根，加交路帳裳，非法駕則乘紫屬輶車……駕三馬。長公主亦屬輶車。大貴人，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畫輶車，大貴人加節畫輶，皆右駢而已。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若蠶，各乘其夫之安車，右駢，加交路，帷裳皆阜，非公會不得乘朝車，得乘漆布輶輶車』。故輶輶者安車之一種，特供婦人所乘也。安車本駕一馬，故有二轅，加兩驂則爲三馬，加右駢則爲二馬，不能駕四馬也（疏廣傳『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此自恩澤特例，故鄉人以爲榮，而懸其安車也）。又安車有兩轅，故有時亦以駕牛，釋名『輶車載輶重臥息其中之車也；輶廁也，所載衣物雜廁其中也；輶車輶屏也，四面屏蔽，婦人所乘牛車也』。然劉熙之時代，據畢沅所考已當建安之際，是亦未可以三國分崩之俗上概漢世矣。

今輶輶見於畫象者，有武氏西闕南面，北面，武梁祠第一石，前石室第七石，前石室第十一石，後石室第二石，後石室第四石，孔子見老子象。其有主名者則爲後石室第二石之西王母車，孔子見老子象之老子車，皆老者及婦人也。蓋老者畏風寒，故亦乘衣車，漢書張良傳：『上雖疾，強載輶車，臥而護之』；注，師古曰：『輶車衣車也』；後漢書桓榮傳：『榮爲少傅，賜以輶車乘馬』；皆其事矣。

【牛車】馬車之輶曲，牛車之輶直，考工記云：

今夫大車之輶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輶直且無撓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陴，不伏其輶，必縊其牛，此無故，惟輶直且無撓也。故登陴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陴，不援其耶，必縊其牛後，此無故，惟輶直且無撓也。

故牛車爲直輶者。

在武氏祠畫象中，惟武梁祠第二石之處士車爲牛車，其餘如前石室第十一石所畫二車，其構造亦與牛車相同，卽轅較直，上以席爲蓬（現在牛車亦以席爲蓬與此相類），惟以馬駕之而已。在漢代牛車爲賤者所乘，宣紀『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嫗，嫗男無故，弟武，皆隨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黃牛嫗』；食貨志『賈人不得衣絲乘馬』是也。貧者亦乘之，高五子傳：『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張湯傳：『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朱雲傳：『雲自是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游俠傳：『朱家……衣不兼采，食不重味，行不過軻牛，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是也。至劉寬父崎雖曾爲司徒，然寬尙隱居鄉里，故亦乘牛車，劉寬傳：『寬嘗行，有人失牛者，就寬車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送還，叩頭謝』，則以處士不願駕馬，非盡由貧賤也。

漢以來每值亂事則馬減少，及休養平息則馬增多。大抵西漢初年馬少，西漢中葉馬增多，東漢初年馬減少，至三國時馬又減，於是牛車爲貴冑所乘矣。食貨志云：『天下既定，民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醯醢，而將相或乘牛車』，足徵漢初馬少也。至武帝時則如食貨志所云：『初七十年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乘犝牝者擯而不得會聚』，此漢中葉馬多之證也。其後征匈奴，馬稍減，然尙足用，故宣帝本始中伐匈奴發騎尙以萬計（見本紀）。及東漢初年光武初起馬尙少，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至東漢中葉馬已減於西漢，如竇憲出師時與耿秉僅各將四千騎，餘則匈奴左谷蠡王萬餘騎，匈奴南單于萬騎，度遼將軍鄧鴻及羌胡義從八千騎，皆非中國本土之所有也（竇憲傳）。至三國時馬愈少，魏志鍾繇傳：『太祖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一千餘匹給軍；太祖與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勳也」』；是又與東漢不侔矣。

蓋西漢猶承秦人養馬故習，漢書景紀如淳注引漢舊儀『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分養馬三十萬頭，擇取教習；牛羊無數，以給犧牲』。又官本漢舊儀：『天子六廄，未央廄，承華廄，駟騶廄，路軻廄，騎馬廄，大廄，馬皆萬匹』。故王朗奏云：『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千有五百

之羣祀，上通天之臺，入阿房之宮，中廢則駢駟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養二萬，而馬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魏志注引魏名臣奏）；即謂此也。東漢則西邊既虛，北邊亦賦與南虜，例諸西京，復不猶矣。至於魏世，邊鄙愈廢，盡括西北戶口，僅得新興一郡，馬之出產，尤不及東漢。晉代魏政，創設未聞，武帝崩，大亂繼起，而馬政遂不堪問矣，安得不將相乘牛車乎？

魏世以還，乘牛車已成通習，其事甚多，不可悉舉。略舉數端，以見其例。魏志韓暨傳：『徙監冶謁者，舊時治作馬排，每一熟石，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爲水排，計其利三倍』，是舊時用馬者，此時已更用人。倉慈傳注引魏略：『顏斐爲京兆太守，始京兆從馬超破後，民多不專農殖。……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狗，賣以買牛』，是當時牛尚不足，無論馬矣。此雖京兆特情，亦自亂後通象，故人臣乘牛，至求之天子外廐，晉書劉超傳：『超後須純色牛，市不可得，啓買官外廐牛，詔便以賜之』，無怪富如石崇，貴如王導，亦皆駕牛不駕馬。此風所播，直至隋唐，故今日除西洋之馬車外，更無曲轡痕迹。（石崇王導事，各見晉書本傳）。

（2）宮室

武梁祠第二石及第三石，前石室第三石，前石室第十四石，左石室第九石，左石室第一石，左石室第七石，孝堂山第一石第二石均有宮室之圖畫，其最可注意者爲武梁祠第三石，前石室第三石，左石室第九石，及孝堂山二石之樓前二柱形物。

在其他石刻中如兩城山石刻，及美國紐約Metropolitan博物院所藏石刻，有與此相類之物，惟此二石所畫者較寬，而武氏祠及孝堂山所繪者較狹而已，其地位及結構仍大略相同。中國營造學社論文漢代的建築式樣與裝飾（集刊五卷二期），認爲紐約所藏石刻爲闕，當無問題；若此石所繪者爲闕，則此其他諸石亦當然爲闕。

闕之實物現存者有山東及四川二省諸石闕，及嵩山之啓母闕。明器中單間高樓亦甚多，如所謂『捕鳥塔』，『望樓』之類，大抵亦闕之變體。蓋闕爲多層而高聳者，有波士頓博物館所藏石刻可資證明也。然漢制天子有闕，丞相有闕，城門有闕，廟墓有闕，士大夫未聞有闕之制。則石刻之闕雖實際爲闕，而其名當不爲闕。

爾雅釋宮：『陝而脩曲者曰樓』，注：『脩長也』，是樓乃長而曲者，長而曲則似以閣道與他樓相連者矣。月令：『可以居高明』鄭注：『高明謂樓觀』也，『觀』不可居，是『樓』亦可稱『觀』；『觀』即『闕』，則『樓』之名亦可施諸『闕』矣。（註）故其制同闕，其名當仍爲樓。

武氏祠所繪中樓有閣道可與兩旁相通，紐約所藏石刻中樓之闕干伸出兩旁，其交通之跡尤顯。按漢世富貴之家多爲樓閣，王鳳傳：『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相屬』。酷吏黃昌傳：『再遷陳相，縣人彭氏舊豪縱，起大舍，高樓臨道，昌每出行，彭氏婦人輒登樓而觀；昌不喜，遂勅收付獄案殺之』。樊宏傳：『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侯覽傳：『起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由此證之，則樓固多有閣道，故樓閣後世常並稱也。武氏祠樓，上有婦人，亦與陳豪彭氏之婦人上高樓者大略相同。

武氏祠及孝堂山皆爲四注屋，此亦較爲尊貴之制。四注屋殷人已有，見考工記。至周凡士大夫以上皆有之，見焦循羣經宮室圖所考（焦氏又謂諸侯以下但有四霤，無四阿，是其式非如今之歇山式不可，然今所見漢之歇山屋頂皆重檐，似今之單檐歇山時當尙未有，焦氏又云不得重屋，便不知所云矣。焦氏之證無四阿，僅據左成二年宋公榑有四阿爲侈一事，然榑固不必同於宮室也）。漢大抵亦然，今石刻及明器仍以四注屋爲多，非如現在僅施於宮殿及廟宇也。

諸石刻宮室之中皆施有帷帳。蓋漢代窗紙未行，故以帷帳蔽風日也。然帷帳實可以示豪貴。張良傳：『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陳勝傳：『其故

（注）闕通常即稱爲樓，三輔黃圖：『建章宮鳳凰闕漢武帝造，高七十丈五尺，……在圓闕門內二百步。……楊震關輔古語云長安民俗謂鳳凰闕爲貞女樓』。是闕亦通謂之樓，其天子與恆人異者，則天子之闕當門，而恆人之樓不當門。公羊定二年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家不臺門』。正義『兩邊築闕爲基上起屋曰臺門』。皆指當門者而言，若只當樓前，則雖其形同闕，自不得謂之闕。又文籍所紀天子之闕低者亦二十丈，若恆人與樓略等者，則高不過漢尺四五丈，尤不侔矣。

人常與傭耕……勝出，遮道而呼涉，乃召見與歸，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爲王沈沈者』。晉書何曾傳：『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皆可見之。至唐窗牖猶有不施紙者，如沈佺期侍宴安樂公主應制：『粧樓翠幌教春住，舞閣金鋪昔日懸』；王邵冬晚對雪憶胡處士：『寒更傳唱晚，清鏡覽衰顏，隔牖風驚竹，開簾雪滿山』，李商隱對雪：『旋撲珠簾過粉牆，輕於柳絮重於霜』。簾當牖，無窗紙可知，然此猶可謂承六朝遺習，如宋代已有紙窗，而簾櫳繡戶猶常見於題詠之事。至若陶舉花萼樓賦（英華四九），完全爲寫實，則可證明唐初猶不用窗紙也。其詞云：

前卷珠簾，後卻疏牖，分渭北之川光，別終南之峯首。千門迴霽，百陌微明，翠幄凝烟，煖青軒以靄映，紅荷浸水，嬌綠浦以縈盈。

其所言適切與慶池旁面對南山之景，則珠簾翠幄，未必爲藝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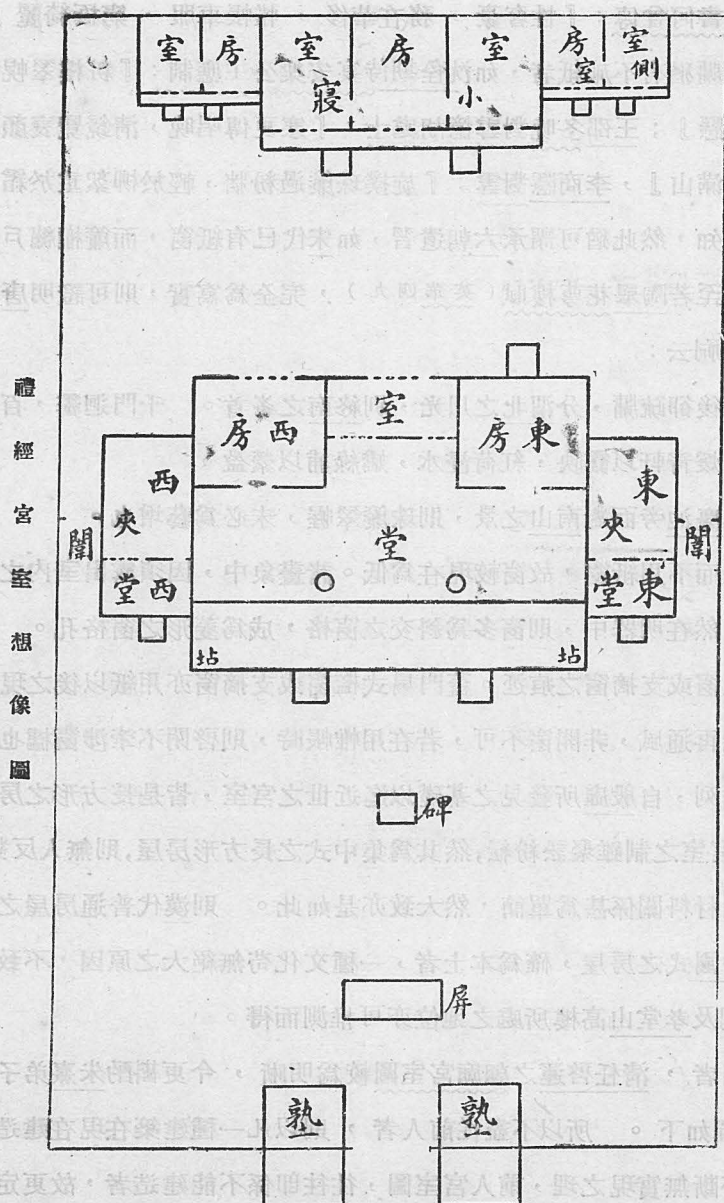
因用帷帳而不用紙窗，故窗較現在爲低。諸畫象中，因須露出室內之人物，故不用窗櫺。然在明器中，則窗多爲斜交之窗格，成爲菱形之窗格孔。其窗並未見門扇式之檻窗或支摘窗之痕迹。蓋門扇式檻窗或支摘窗亦用紙以後之現象，因窗櫺糊紙即不能再通風，非開窗不可，若在用帷帳時，則啓閉不牽涉窗櫺也。

宮室之排列，自殷虛所發見之基礎以迄近世之宮室，皆是長方形之房屋，集中排列。儀禮宮室之制雖聚訟紛紜，然其爲集中式之長方形房屋，則無人反對。明器之房屋，雖因材料關係甚爲單簡，然大致亦是如此。則漢代普通房屋之排列大致與今同，蓋中國式之房屋，確爲本土者，一種文化苟無絕大之原因，不致驟變也。若是則武氏祠及孝堂山高樓所處之地位亦可推測而得。

作宮室圖者，清任啓運之朝廟宮室圖較爲明晰，今更斟酌朱熹弟子之家山圖書，作平面圖如下。所以不盡從前人者，則以凡一種建築在現在建造爲不可能者，在古代亦斷無實現之理，前人宮室圖，往往即係不能建造者，故更定之。至於所以如此改定之詳細節目與理由，爲避繁複，不具述，蓋宮室之平面圖應較車制易於明瞭也。

依此圖，凡釋儀禮宮室之制者，自李如圭以下，皆無大衝突，故暫決定如此。漢代去古未遠，當不少共通之點，故對武氏祠及孝堂山之宮室制度，亦依此解釋之。

武氏祠及孝堂山所繪之宮室，大抵爲朝而非寢，則其闕式之樓閣，大抵亦卽東西廂



之變形；蓋東西廂當前望之爲其側面，故較狹，更加縮小，便成柱形。在紐約所藏石前兩闕較闊，尙存西廂形式。孝堂山所繪，則大抵三庭相續，兩廂爲公用者，東庭之西廂卽中庭之東廂，西庭之東廂卽中庭之西廂也（兩廂較正殿爲高者，今尙有此種形式，如大同善化寺之文殊普賢閣，此雖遼金建築，其所承受當仍有較早之範本也）。

附記：其至，入門圖，具一於曾主於吾東，則南堂前。其出，則

此稿作成在南京失守以前，中經遷徙數次，寄稿付印又經周折，故今日方出版，其中有亟須訂正者，具列於下：

(一)禮經宮室之制，應爲堂三間，其後爲東西房，及室。堂之左右牆爲東西序，堂室房合爲一單位。東西序外爲東西夾，東夾之北墉達於與東房中部相當之處，其北不達於北階，故東西夾爲堂之附屬建築。兩夾之前爲東堂西堂，其前有小階謂之東西垂或側墀。廊廡之制爲禮經所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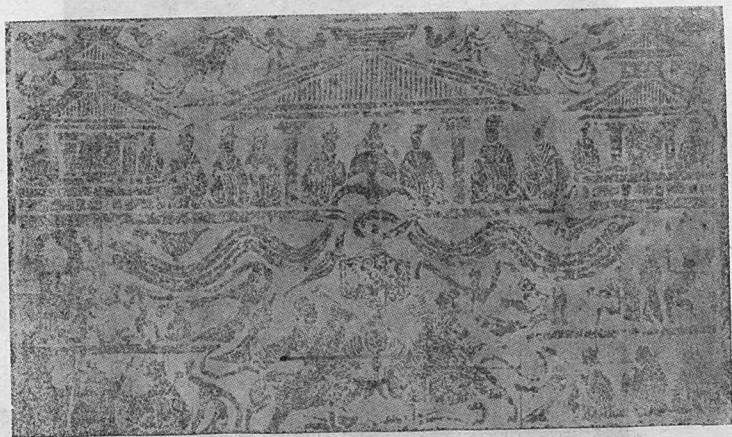
東西夾亦謂之閣，漢之天祿閣卽此類。漢畫兩旁之屋有高於中間之屋，且有兩層者，卽此種制度。

以上詳見最近拙著之『禮經制度與漢代宮室』，在北大紀念刊發表。

(二)武梁祠及孝堂山及南陽等畫象，貴人之後及左右，皆有人執半圓形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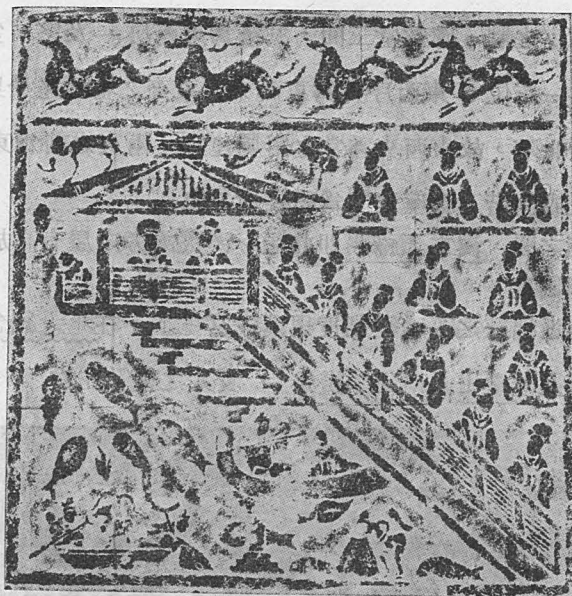
武梁祠畫象（穆王見西王母及車馬畫像）



兩城山畫像之一（宮庭）

物，此爲扇。前過安南時，那廉君先生曾得一具，圖附入，至其證據，此處不能詳舉，當另爲文論之。

二十七年十二月，昆明。



安南竹扇

禮 經 宮 室 想 像 圖

